

# 英汉翻译的影响与香港书面汉语的语义结构变异<sup>[1]</sup>

——以“机会”一词为例

朱志瑜<sup>1</sup> 傅勇林<sup>2</sup>

(1.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九龙; 2. 西南交通大学外语系, 四川成都, 610031)

**摘要:** 本文以香港报章有关语言材料(尤其是在香港书面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机会”一词)为依据进行语义分析, 试图从翻译的角度、在语义这个平面上考察并确定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的影响, 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 香港书面汉语正与现代汉语产生着某种程度的疏离。其内在动因源自英语的影响, 另外, 独具香港特色的翻译活动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援英格汉”的语言转用策略。据此又派生出相应的翻译准则和手法, 用以应对复杂的句法/语义结构, 使翻译成为一种简单的符号转换活动, 因此造出的汉语译语经过扩散, 便与其中所携带的英语句法/语义结构属性一起进入随时虚位以待的香港书面汉语, 通过相应的句法整饬和语义结构调整, 使其产生变异, 以颇具英语特征的异态和异质面貌卓然独立于现代汉语。

**关键词:** 英汉翻译; 影响; 香港书面汉语; 语义结构; 变异

**Abstract:** The journalistic cants (chance, in particular) as generally used in HK written Chinese lie at the basis of the present study, hopefully to confirm the effects of Anglo-Mandarin translation upon the deviation of semantic structures in HKWC. The estrangement of HKWC from modern Chinese, it is proved in terms of semantic model and bilingual translations, has evidently resulted from the excessive activity of translation characteristic of HK culture, which, in turn, has found its resultants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ttributes in HKWC after years of acculturation. The study, as it is assumed, is none other than an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effects, the functions the translation has per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deviant estrangement and the reasons that have motivated the deviations, in the hope that it might be conducive to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rules of the estrangement, and finally, to the would-b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principles beneficial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d hoc*.

**Key words:** Anglo-Mandarin translation, effects, HK written Chinese (HKWC), semantic structures, deviation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02)10-0055-07

## 0 引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 由于英语的历史影响, 香港书面汉语在语音、句法和语义三个平面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迄今为止, 有关的研究<sup>[2]</sup>都主要集中在语法/句法平面, 还很少有人对英语影响下的香港书面汉语作出语义结构描写, 探讨这些变化的异态分布, 并据此从翻译的角度挖掘这些变化的内在成因。有鉴于此, 本文拟就从香港报章<sup>[3]</sup>中收集到的有关语言材料(尤其是在香港书面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机会”一词)进行语义分析, 试图从翻译的角度、在语义这个平面上观察并确定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的影响、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导致这些变化产生的有关原因, 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在英语影响下香港书面汉语的某些演变规律, 以对将来更加深入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于香港书面汉语的语义结构变异及其分布情况, 我们

曾经用句法框架配合语义结构描写将已收集到的部分语言材料作过粗略的分类并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讨论。<sup>[4]</sup>通过分析和研究, 我们认为, 相对于现代汉语来讲, 香港书面汉语在句法与语义这两种结构关系上, 其总的发展趋势是“尚简”, 而简化又主要是通过相应句法成分的消失和语义结构的调整这两种手段实现的。句法成分消失与语义结构调整的结果就是这两种结构关系的异态分布, 并因此与现代汉语产生了较大的疏离。下面即从语义特征和翻译的角度, 以香港书面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机会”一词与英文的 chance 为例进行讨论。

### 1. 香港书面汉语的异质特征及其分布: 以 chance 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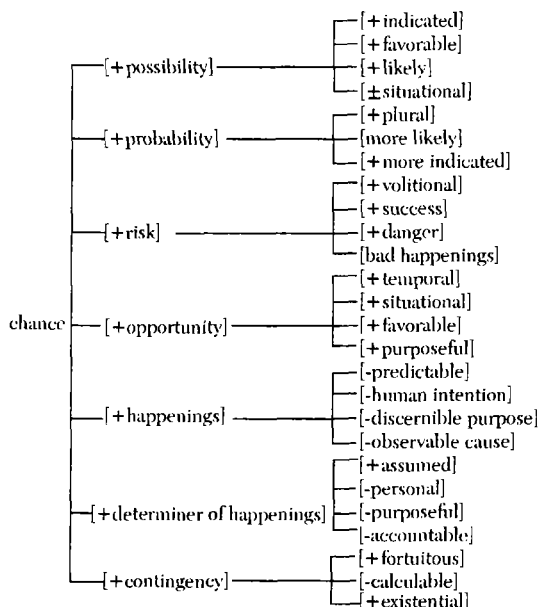
这里所谓的异质特征主要是就语义特征而言, 这些特征多数可以和句法/语义结构的异态分布共时出现, 二者之间相互影响, 都在语义的变异过程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

**作者简介:** 朱志瑜(1954-), 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 比较文学; 傅勇林(1959-),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语言学, 比较诗学, 翻译学

**收稿日期:** 2002-03-07

在讨论香港书面汉语的变异现象的时候,引入语义特征并借以确定其异质特征和分布情况,应该说也是很有必要的。

1.1 语义特征通常借助“值”的形式来体现,每一个值又呈现为正负值的“二分对立”,是在对某一类语言成分的概念内容进行概括抽象以后所形成的,比如汉语动词的语义特征即可用[±持续]、[±完成]和[±动态]这三个特征来体现。(戴耀晶 1997:15)但是语义特征的具体分析却遵循原子主义原则依次进行分解,然后再合成一个语义矩阵,以充分反映该语言成分的语义内容。比如在英语中, chance 这个词经过语义特征分析以后所形成的语义矩阵即可图示如下:



(附表:英语 chance 一词的语义矩阵)

分析这个矩阵可以看出, chance 这个词的中心义多取正值,边缘义多取负值,而且语义指向也不同,中心义多指向有意志([+volitional])有目的([+purposeful])、不管环境如何([±situational])、不计成功与否([±success])、不顾后果如何敢于进取([+risk])、以争取任何机会获得成功([+favorable])的生命体(personal);而边缘义则多指人以外(impersonal)的超自然因素,如旦夕祸福([±happenings])或不测之风云([+contingency])等等。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不妨把 chance 一词所具有的共同的语义特征予以提炼,分别标记为:

[±personal] [±favorable] [±purposeful] [±situational]

中心词均取正值,边缘义均取负值。这样, chance 这个词的语义特征及其分布情况就很清楚了,至于其语义结构则同样可以从上述分析中提炼出来,兹标示如下:

中心义:施事+动作+受事(+目的)

边缘义:处所+动作+结果

这两种语义结构关系和上述语义特征在句中通常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如果语义结构呈异态分布、语义特征产生异质演变,就会产生变异,并影响句法结构及其要素的共时呈现。

chance 一词在汉语中通常译为“机会”,根据现有的语言 98)

材料统计,香港书面汉语使用“机会”一词的频率非常高,与现代汉语相比,在语义特征上也已产生严重的变异。例如:

(1)消息透露相信成功充公大富豪集团资产的机会很微。(D/A2/21/10/98)

(2)但本港仍有机会悬挂八号风球。(D/A1/26/10/98)

(3)该儿童更有较大机会吸烟。(M/A2/30/9/98)

(4)这群有吸烟经验的小学生长大后很大机会将成为习惯性吸烟者。(M/A2/30/9/98)

(5)为了减低在沉箱等密闭空间工作人员遇到意外甚至丧失性命的机会,港府颁布了新的条例草案。(X/A12/23/9/98)

(6)最新的失业率会介乎百分之五点一与百分之五点二之间,且很大机会是百分之五点二。(X/A13/15/9/98)

(7)尚有更多兑现飞行里数的机会。(D/A12/16/10/98)

(8)银行界普遍预期银行工会今日决定减息机会不大。(X/A2/9/10/98)

(9)全球经济衰退机会高。(D/B1/18/9/98)

(10)多名医生指她可以再行的机会甚微。(M/B20/23/9/98)

“机会”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6:58)所提供的定义是:“恰好的时候;时机;错过机会;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根据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现代汉语的“机会”一词也具有英语 chance 一词的中心义所具有的语义特征,即[+personal][+favorable][+purposeful]和[+situational];二者语义结构也一样,但与 chance 一词边缘义的语义结构和语义特征大相迥异,但是上面所举出的例子已向 chance 边缘义的语义结构和语义特征靠拢,却又不具备 chance 一词的边缘义,可见“机会”一词在香港书面汉语里已产生双重变异,既有悖于现代汉语,也有别于现代英语。导致这种变异产生的原因很多,但翻译问题无疑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此处容不赘述,将在下节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变异在香港书面汉语里非常普遍。请看如下例子:

A. (11)危险驾驶(X/B13/15/9/98)

(12)压力团体(D/A3/10/10/98)

(13)怀疑纵火案(M/A20/15/9/98)

(14)正面发展(D/A4/16/10/98)

(15)医疗需要(X/B15/15/9/98)

(16)支援服务(X/B9/8/10/98)

(17)危机管理(X/A15/18/9/98)

(18)商业信心(X/B7/9/10/98)

(19)实质国民生产总值(X/B7/9/10/98)

(20)全球性的耻辱(X/A5/28/9/98)

(21)反罪恶巡逻(X/B16/15/9/98)

(22)有合格国家(X/A2/23/9/98)

(23)预期心理(D/B2/30/9/98)

(24)语文争议(X/A6/9/10/98)

(25)道德缺失(X/A4/23/9/98)

B. (26)总统情绪上和精神上都不稳定。(X/A5/28/9/98)

(27)相信及实在地投下资源期待发展成什么创新科技中心。(E/13/10/98)

(28)本报以科学化的调查方法成功访问了 1400 多名市民,并经加权处理,统计学上足以反映全港市民的意见。(D/A2/10/10/98)

(29)凑巧地,今年九月有新航展翅,为你开拓服务新里程。(A/14/9/98)

(30)少女艾美昨日上午由养父母陪同,在台北市议会正式与生母颜利拥抱相会。(D/A6/30/9/98)

(31)这是象征式清楚表示各国代表本身支持克林顿。(X/A4/23/9/98)

(32)政府振振有辞地声称不可能扰民地逐户拍门查问。(X/A2/15/9/98)

(33)按市场要求客观地及规律地推出供应。(E/13/10/98)

(34)然而,由政府这般细节地去带领个别行业发展是非常危险的。(E/13/10/98)

(35)只要让儿童较实质地接触到世界,包括我们成人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和工作,他们就会看到什么才是对我们其他人具有意义。(E/13/10/98)

(36)他知道他犯不着跟随克林顿的步调去狗尾续貂地大谈民主人权。(D/A19/12/10/98)

(37)廖允宜言行合一地,将平时的教导在行动上表达出来,对我的成长是个榜样。(M/D3/28/9/98)

(38)冷血地隐瞒事情真相。(X/D6/22/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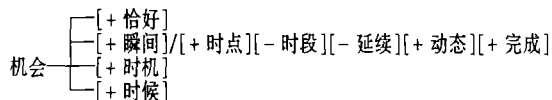
上述例子可以说每一种都体现了一种变异类型。相对于现代汉语,这些例子无论是语义结构还是语义特征都呈异态分布,充分体现了香港书面汉语与现代汉语的疏离。那么,这些变异或疏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鉴于英语作为强势语言在一个半世纪中对香港书面汉语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可以说,英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置疑的。而由于双语活动机制的现实需要,英汉翻译又在其中扮演了“桥梁”角色。因此,就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的影响而言,翻译活动(尤其是英汉翻译)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

### 1.2 从 chance 看英语在语义特征上对其的影响

就香港书面汉语而言,英语在语义特征上的影响可以说是既深且广。许多例句乍一看似乎是句法共现规则产生了变异,其实是在英语的影响下其语义特征有了变化,从而导致语义场、语义格以及语义指向产生转移,这才是产生变异的主要原因。关于语义格的转移,我们已经做过详细的讨论<sup>[5]</sup>,因此这里主要讨论语义特征的变异问题。

毫无疑问,像语义特征的转移(缩小或扩大等)这种情况最容易受到英语的影响。在对现有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可以发现,香港书面汉语借助英汉翻译受英语影响而在语义特征上出现了“简化”、再“简单化”,最终导致“语义模糊化”的趋势。以上文 1.1 论及的“机会”一词为例,英文 chance 包括中心义和边缘义在内原来约有七个义项,每个义项具体的语义特征也各有差异,但从例(1)至(10)可以看出,香港书面汉语在面对不同的语境时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一律使用“机会”应对,而不根据汉语语义场及英语不同的义项“就事论事”、“因文生义”,因此造出了许多类似的“不合格

的”(ill-formed)句子。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很多,但是不注意词汇、义项、语义特征之间的相生关系,只是刻板地信守语言的“类比规律”,时时奉行“从简/省力原则”,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词汇、义项与语义特征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包孕相生”为特点,词汇包孕义项,义项包孕语义特征。但反过来,又是语义特征生成义项、义项生成词汇概念内容。语言的日常使用主要靠词汇进行,由于香港书面汉语与英语浸淫已久,在“类比规律”(又称“同型原则”,强调一个意义单位只能有一个形式,一个概念只能用一个词汇表达)(Aitchison, 1991:146)的作用下,借助于英汉词典的翻译(或定义),只用“机会”一词简单应对所有的情况,而不顾汉语语义场对其原有的语义限制。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996:581)所提供的定义,汉语“机会”一词的语义特征应是:



该典提供的示例是“错过机会;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正好符合上述特征。可是观察例(1)一(10)中“机会”一词的用法,可以看出它们已与现代汉语产生严重的偏移。再看与 chance 一词相关的英文例句:

a. possibility: [+ indicated] [+ favorable]  
[+ likely] [(situational)]

There's a fifty-percent chance of his success in the game.

b. probability: [+ more likely]  
[+ more indicative]

Chances are he's already gone.

c. risk: [+ volitional] [(success)]  
[(danger)] [(bad happenings)]

The rope might break but that's a chance we'll have to take.

d. opportunity: [+ temporal] [+ situational]  
[+ favorable] [+ purposeful]

Ralph was waiting for chance to relax.

很显然,在 chance 这四个中心义中,只有 opportunity 这个义项大致可以和汉语的“机会”吻合,但是香港书面汉语却依英汉词典翻译以后所给出的定义以偏概全,将上述各个义项统统以“机会”处理,同时还不理睬各个义项所携带的语义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包孕相生”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英文句子在香港书面汉语里就成了:

a. 他有五成机会在比赛中夺冠。

b. 很大机会他已经走了。

c. 那条绳子有机会断,但那是一个机会,我们必须抓住。

d. 拉尔夫正等待机会放松。

这些句子实际上就是例(1)一(10)的翻版,而(1)一(10)又似乎可以原封不动地还原成英文(如例(6),即可以还原成 Chances are 5.2%)。可见香港书面汉语在受英语影响的过程中,一方面“亦步亦趋”,一方面“一切从简”,“见形忘义”,取形弃神。当然,“用唾手可得的言辞说话著文总是比较省事”(Weinreich, 1953:57),但是却忘了 chance 一词原有的不同的义项,自然应该有不同的解释,更何况相互之间语义特征也有所不同。因此应当“因文生义”,分别采用不同的词语,

表达不同的义项,体现不同的语义特征。

## 2 chance = 机会? 英汉翻译与语义结构变异

### 2.1 翻译策略与翻译手法

毫无疑问,香港书面汉语已经并正在产生的语义结构变异与香港的英汉翻译活动息息相关。这里主要讨论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等问题。

根据德国学者 Krings (Fawcett, 1997: 140 - 41) 和 Löscher (1991: 280) 的研究,一般的译者通常采用如下三种翻译策略: a. 单词对等策略; b. 义从典出策略; c. 符号优先策略。这三种策略可以戏称为“翻译玩家的把戏”。第一种策略坚持取义以单词为单位,要求逐字对译,绝对不可越雷池半步;第二种策略坚持依靠双语词典,无典不译,义从典出;第三种则径取符号,不顾意义,只在此符号与彼符号之间捉对撮合,试图通过一对一的联想关系从事语言形式符号之间的简单转换,worker 是工人,艺术是 art,机会是 chance, share 是分享,认为这就是翻译。这样一来,上述翻译策略就演变成了如下两条为一般译者所广泛采纳的“策略”: a. 谨守原文,亦步亦趋 (playing-it-safe); b. 跳开原文,孤注一掷 (risk-taking)。前者造成原文的语义减损,后者造成原文语义乖离。(Fawcett, 1997: 140) 不仅如此,在翻译过程中碰到难以定夺的情况的时候,在上述策略的指导下,这些译者通常还会恪守如下一些“翻译准则”,比如:

a. 谨守原文字面意义; b. 严格限制译文句长,“绝对不可超出原文句长的 10%”(Krings, 1986: 430); c. 字字对应,译文遣词必须随时与原文一致; d. 原文单词不认识的时候,绝对不能用词典尚未收录的单词去翻译; e. 翻查词典即使不知所云,也必须绝对相信词典为“第一正义”; f. 取义心中没底的时候径取词典提供的第一个义项。(Fawcett, 1997: 140 - 41)

毫无疑问,这些所谓“策略”与“准则”也基本符合香港一般译者的翻译实际。可以说他们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在单一的词汇平面进行,一求逐字对应,一字一义;二求依靠词典一劳永逸,能够以一驭万,不求甚解。在这种翻译策略的诱导下,用以应对复杂的句法/语义结构的翻译手段势必过分简单粗糙,所拿出的翻译文字一旦扩散,便会对香港书面汉语产生相应的影响。

### 2.2 翻译手法与语义结构变异

这里所谓的翻译手法主要指派生于上述几大“准则”的一些具体的处理方式。对此进行讨论,其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些翻译方式的探讨来透视香港书面汉语语义结构的变异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想借助于这种探讨说明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的实际影响,以及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 2.2.1 一字一译法与语义变异

这种手法源自“单词对等策略”,体现了基于一字一义原则的简单类比思维。(Aitchison, 1991: 146) 采用这种手法处理英文词汇通常只会注意其某一个义项与汉语对等词某一个义项的简单对应,并不考虑词汇、义项与语义特征三者之间所存在的“包孕相生”关系,这样就直接破坏了汉语的语义结构,导致变异产生。在 1.2 里我们曾就英文 chance 与汉

语“机会”之间的对译关系列举若干例句做过比较详细的讨论,现在结合这个问题再继续作一番探讨。

根据 1.1 为 chance 所建立的语义矩阵,可以看出 chance 的中心义有四个义项;在 1.2 里我们还给出了这 4 个义项及其语义特征和相应的例句。有趣的是,将这 4 个英文例句和相应的汉语译例两相比较,即可看出, chance 在这 4 个例句中原本具有不同的义项和语义特征,因此可考虑根据这些义项及其语义特征用相当的汉语词进行处理。比如可将上述例句试译如下:

- 本次比赛他有五成/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夺冠。
- 他很可能已经走了。
- 这条绳子可能会断,但这个风险我们得冒。
- 拉尔夫正想瞅个空儿轻松轻松。

但是,在逐字对译手法的处理下, chance 一词所具有的四个中心义项“不假思索”地被一律翻译成了“机会”,可是一旦“机会”这个词不顾语域的变化及其他语义限制而进入汉语语句,即会和汉语相应语句的语域及语义限制条件发生冲突,终而导致变异。

1.2 中为汉语“机会”一词所给出的语义特征表明,该词在现代汉语里主要具有褒义([+ 恰好])和时点这两个语义元素,因此它可以进入的语域都必须以这两个特征为依归,否则便会产生语义变异。但是,观察上述香港书面汉语所提供的译例,可以看出“机会”置身于这些语句不啻是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双重变异,因为这样既抹煞了 chance 一词不同的义项和相应的语义特征,又与汉语语域和相应的语义共现条件相冲突,当然更严重的是造成了香港书面汉语的语义变异。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情况在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语料中非常普遍,本文所引述的所有例句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原因之一便是在翻译中采用了逐字对译法,坚持一字一译,以不变应万变,没有“因文变义易词”的意识。

#### 2.2.2 异词一译法与语义结构变异

这种手法与一字一译法的共同点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变者在汉语这一方,不同之处在英文。前者是一词多义,一译当之;后者是异词近义,也一译当之。由于这种情况多出现在述宾结构中,体现为动词与名词之间的及物性关系,因此而产生的变异直接影响到语义格的迁移变化并与汉语疏离,所以也必须引起重视。请看下面的例句:

A. (39) She has felt blessed that she has been able to build up her career while enjoying a balanced and happy family life. (Sing Tao Daily (Job Market), November 21 - 27, 1998, p. 20)

译文:她觉得自己很幸福,不但能建立自己的事业,还能享有平衡、快乐的家庭生活。(出处同上, 21 页)

(40) Perhaps that's how I have been able to build a good team that works in harmony. (Sing Tao Daily (Job Market), October 31 - November 6, 1998, p. 5)

译文:也许这就是我能建立一组和谐的工作队伍的原因。(出处同上, 6 页)

与这一组情况类似的例子还有如“建立这方面的工作”(X/B9/8/10/98)、“建立孩子的成功感”(M/D3/28/9/98)以及“建立孩子身心健康”(M/D3/28/9/98)等。

B. (41) In the conference room behind him, eight company representatives are completing a three-day workshop. (*Sing Tao Daily* (Job Market), November 21 - 27, 1998, p16)

译文:在他背后的会议室里,有八名公司代表人员,正在进行为期三天的工作坊。(出处同上,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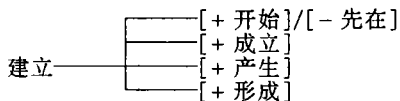
(42) He said the third quarter is "obviously experiencing a hard period." (*Sing Tao Daily* (Job Market), November 21 - 27, 1998, p. 8)

译文:他说香港的经济现时正在进行一个痛苦的调整期。(出处同上,9页)

与这一组情况类似的例子还有“进行高姿态地展示实力”(X/A11/9/10/98)、“进行洗黑钱”(X/A10/15/9/98)和“与他进行访谈”(X/Job Market/31/10/98)等。其他的译例还有:

- (43) 改善驻日美军的操守标准(D/A3/16/10/98)
- (44) 维持读者忠诚(M/D6/14/9/98)
- (45) 贯彻“衣锦还乡”的传统意义(D/A19/16/10/98)
- (46) 厉行内地官员不得干预特区(D/A19/30/9/98)
- (47) 减低警方的角色(X/A13/15/9/98)

以A组为例,英文句子中所用的动词分别为 build 和 build up(也有 institute, constitute 和 establish 等),译文中每一个句子的述位一律用动词“建立”,后面与其搭配的名词分别为“事业”、“队伍”、“成就感”、“健康”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996:621)所提供的定义,“建立”一词的语义特征为:



其共现语义特征为 [+ 机构][+ 关系][+ 体制][+ 学说][+ 理论]等,并没有上述名词的语义特征,说明这三个句子中的“建立”已经违反了语义共现条件。但是再深究一步,即可发现它们同时还破坏了汉语的语义结构。比如以“建立这方面的工作”为例,在汉语里能够在语义上与“工作”共现的动词可能是“开展”或“进行”,这两个词共有的语义特征是 [+ 先在](《现代汉语词典》,1996:660 - 702),指受其管辖的名词其语义实体应该是事先就已存在的,因此它们的语义结构关系应该是“动作 + 受事”。(菲尔墨,1980:5)由于“各格的形式或者根据支配词的独特性质来决定,或者根据某种标记关系来决定”(菲尔墨,1980:19),这样一来,原来的语义结构关系“动作 + 受事”现在却由于异词一译法的处理而产生结构变异,变成了“动作 + 结果”。并且,由于“建立”和“工作”二者所要求的语义共现条件不同,因而产生语义对立,这就打破了汉语语义结构的平衡,使香港书面汉语在这一点上又与现代汉语产生了疏离。

### 3.2.3 偏倚词典定义对英汉翻译及汉语语义结构的影响

这种手法无疑是“义从典出”翻译策略的产物。受其影响,译者奉词典为圭臬,坚持无典不译、义从典出的原则,同时又恪守“词典为第一正义”、“径取词典第一个义项”(Fawcett, 1997: 140 - 41)等翻译准则,希望借词典一劳永逸,可以执一驭万,解决翻译中复杂的语义推敲与甄选问题。在这些译者的心目中,“词典就是语言的镜子,词典关于语义

及用法的描写准保没错”。(M. P. Stark, 1990: 18)但是“词典不仅是参考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M. P. Stark, 1990: 1),在以历史原则编写的词典中(如《牛津英语词典》),一个词条的完整叙述往往就是一部微缩的词源史或文化史,使用这类词典无异于“知识考古”,其中大有讲究,绝不可等闲视之。其次,再从词典的语义构成而言,可以说词典义就像是与语义实体“分崩离析”以后处于“真空”状态的“待用物”,入句与否其义大别,因此深研词条各义项所构成的语义场,同时坚持“因文生义”的原则,遇词反复推敲,“酌情取义”,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另外,词典的词条罗列与义项序次也大有名堂,如果对文义不解而“径取词典第一个义项”,那就必然会出问题。如果单凭第一个义项作翻译,那么“圆枘方凿”的事情就不可避免,严重者肯定会影响甚至破坏译入语的语义结构,最终导致变异产生。关于词条及义项的罗列,以本地广泛使用的《牛津当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sup>[6]</sup>为例,其通用的原则有两条:

- a. 如某词内部词义差别较大,则该词分两个甚至多个词条处理,每一个词条均标注序号以便翻查;
- b. 如某词内部词义只有细微差别,相互语义联系紧密,且涉及词性转移,则列为一个词条,下分不同的义项。

除此以外,一般的词典主要还根据以下三个原则处理义项序次:

- a. 历史原则:按词条义项的历史发展排序,第一个义项即是某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时产生的意义,也是该词最古老的意义;
- b. 核心义原则:某词条各义项围绕中心词排序,第一个义项是核心义,居语义场中心地位,派生义依与核心义的亲密程度排序,最后一个义项与第一个义项关系最为疏远;
- c. 频率原则:根据语料库的数据统计,将出现及使用频率最高的义项排在第一位,以下依次排序,最后一个义项出现及使用频率最低。

可以想见,不了解这些原则,而“径取词典第一个义项”去作翻译,大多都会出问题。比如取一本以历史原则编写的词典去翻译当代英文文献,取义时不顾历史原则,“径取第一义”,所得到的效果大概与“圆枘方凿”相差无几。

根据上面所讨论的几点去考察香港书面汉语中所反映出来的语义结构变异问题,可以看出“词典至上”等翻译处理手法对其影响很大。下面还是以英文 chance 一词及相关的汉语译例为对象略作说明。

让我们来看 chance 一词译作汉语“机会”时在英汉词典中的排列次序。为便于比较,我们将 chance 一词的 opportunity 这个义项在英文词典中的排序情况列出,以作参考:

- a. *The Oxford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第4个义项
  - b.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Massachusetts: Merriam - Webster Inc., 1986) 第2个义项
  - c.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1st ed. Longma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1995) 第2个义项
  - d. *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7) 第4个义项
1. 《新英汉词典》(香港增订本)(香港:三联书店,1988)

### 第1个义项

2.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第1个义项第2个义位<sup>[7]</sup>

3. 《新英汉词典》(何万顺主编)(台湾:三民书局,1995)第1个义项

4. 《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1个义项

很明显,在这个义项上英语单语词典和英汉双语词典已经错位,翻译时无视这一点,不会“因文生义”,却“径取第一义”,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就会不得要领,甚至义乖意移。而这样的译句在进入香港书面汉语以后,根据语言词汇扩散原则<sup>[8]</sup>,即会引起相应语义结构及语义特征的渐变或突变,进而导致语义的共时或历时变异。chance译作汉语的“机会”(见上列各英汉词典),并且作第一义项处理,译者再参以简单化的翻译准则,据此随意翻译,而不“随文解义”,“就例发凡”,因此影响到香港书面汉语的语义特征及语义结构。例(1)-(10)就是最好的例证。余光中在为《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4)所写的“绪言”里就曾针对这种翻译手法提出过间接而委婉的批评:“在查某字某词之际,应该把它所属的标题仔细读完,包括例句。英文往往一词数解,常用词的定义尤为繁复,初习者必须逐条耐心细读,若是只查了前面的一两条说明,便含糊接受,就会文不对题。”实际上,如上所述,所谓“文不对题”还只是一个翻译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译文既立变成汉语,所产生的变异改变了汉语原有的语义结构属性,即会导致汉语语义的结构性重组,对香港书面汉语产生相应的影响。上引例句与现代汉语面貌迥异,这可以说是原因之一。这种变异肇自英语,取径于翻译,经词汇扩散,以后又“入主”香港书面汉语。“机会”一词在其中的大量异态分布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 3 结论

3.1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香港书面汉语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以异质生成为特点,已经并正在使香港书面汉语与现代汉语产生着某种程度的疏离。这个过程的内在动因源自英语的历时与共时影响。另外,独具香港特色的翻译活动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在香港这个多语共生的社会中语言之间的接触与影响必定离不开翻译的介入,因此从翻译的角度入手探讨在英语的影响下香港书面汉语语义结构变异的内在成因及其演变规律就成了本文所重点考虑的问题。

3.2 就香港书面汉语中“机会”这个词而言,通过对其语义特征的详细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英语 chance 一词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当然其中还有英汉词典和翻译的“功劳”,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香港书面汉语的“机会”一词语义场得以扩大、语义特征产生变异,逐渐成为考察香港书面汉语语义结构变异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词。类似的情况在香港书面汉语里非常普遍,本文援引的所有例句几乎都可以加以同样的分析,说明同样的问题。

3.3 上述讨论还表明,英汉翻译(包括英汉词典的释义、义项和语义特征)在香港书面汉语语义结构发生变异的过程

中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主要是由香港的现实语言格局所决定的。除“扬英抑汉”的语言政策,“亲英弃汉”的语言态度以外,“援英格汉”的语言转用策略应是香港翻译策略的主要理论根据,据此又派生出相应的翻译准则和翻译手法,用以应对复杂的句法/语义结构,使翻译成为一种即时即兴、执一驭万的简单的符号转换活动,因此而造出的汉语译语经过扩散,便与其中所携带或积淀的英语句法/语义结构属性一起进入随时虚位以待的香港书面汉语,通过相应的句法整饬和语义结构调整,使其产生变异,以颇具英语特征的异态和异质面貌与现代汉语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疏离。

3.4 显而易见,香港书面汉语的异质生成基于英语的深刻影响,同时又以翻译为中介,其演变趋势以日益英语化为特点,其结果则与 Aitchison 所论及的土耳其籍希腊人所讲的土耳其式希腊语相差无几,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视野里,这无疑又是一个特例,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考虑到译入语通常会“乔装打扮”以适应宿语之句法和语义结构特点(比如佛籍东渐,梵文及胡语即是如此)才能进入宿语语言系统这样一条规律,香港书面汉语的变异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宿语之身份反向迁移,这对于语言学研究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

### 注释:

- [1]本文系香港理工大学资助科研项目“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的影响”的子课题,特此鸣谢。
- [2]参谢耀基(1990),《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光明图书公司,香港;Chan, Y. H. 1993.
- [3]英语语法对香港中文的影响, *Working Papers in Languages & Linguistics*, 5: 135 - 145,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另参 Kubler, Cornelius. C. 1985. *A Study of Europeanized Grammar in Modern Written Chinese*.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还有以下两种材料也对同一问题作了一些研究; Chan, B. H. S. 1993. In search of the constraints & processes of code - mixing in Hong Kong Cantonese - English bilingualism. *Research Report 33*,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Li, David Chorshing. 1994. Why do Hongkongers code - mix?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Research Report 40*,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4]笔者参考了香港几份主要的报章,起止日期自1998年9月至同年11月。因篇幅所限,本文下引例句均用相应代号注明出处,其中M代表《明报》、S代表《星岛日报》、D代表《东方日报》。引例中的代码如X/D6/22/10/98指1998年10月22日《星岛日报》D6版,下同。
- [5][6]参朱志瑜、石定栩(1998),《香港书面汉语的语义结构变异:英语的影响》。
- [6]Hornby, A. S. & A. P. Cowie & J. Windsor - Lewis. 1974.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3rd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原版英文词典并无该定义,此系译者所加。
- [8]参王士元(1997),《词汇扩散理论:回顾和前瞻》,《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一辑,黄正德主编,155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北京。

### 参考文献:

- [1]Aitchison, Jean. *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下转封四)

(上接第 60 页)

- [2] Anderson, John M. *Case Grammar and the Lexicon*. Coleraine: University of Ulster, 1984.
- [3] Bolinger, Dwight & Donald A. Sears. *Aspects of Langua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81.
- [4] Chan, B. H. S. In search of the constraints & processes of code-mixing in Hong Kong Cantonese-English bilingualism. *Research Report 33*,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1993.
- [5] Chan, Y. H. 英语语法对香港中文的影响, Working Papers in *Languages & Linguistics*,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1993/5: 135 - 145.
- [6] Cook, Walter A. *Case Grammar: Development of the Matrix Model (1970 - 78)*.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7] Cruse, D. A. *Lex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8] Dirven, René & Günter Radeen (ed.). *Fillmore's Case Grammar: A Reader*. Heidelberg: Groos, 1987.
- [9] Fawcett, Perter.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 [10] Fillmore, Charles J. The case for case. In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ed. Emmon Bach & Robert T. Harms, 1 - 88.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8.
- [11] Kubler, Cornelius C. A Study of Europeanized Grammar in *Modern Written Chinese*.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1985.
- [12] Li, David Chor-shing. Why do Hongkongers code - mix?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Research Report 40*,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 [13] L? scher, Wolfgang.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 Tübingen: Günter Narr, 1991.
- [14] Stark, M. P. *Dictionary Workbook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Dictionary Workbooks for th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0.
- [15] Weinreich, Uriel. *Language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Mouton: The Hague, 1953.
- [16] 戴庆厦. 语言和民族[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4.
- [17] 菲尔墨. “格”辩[A]. 胡明扬译, 语言学译丛(第二辑)[C]. 国外语言学编辑部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1 - 117.
- [18]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9] 陆俭明. 关于语义指向分析[A]. 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一辑)[C]. 黄正德主编,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34 - 48.
- [20] 缪锦安. 香港当前的语言状况和合理可行的规划[A]. 一九九七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论文集[C]. 香港: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1996: 76 - 82.
- [21] 邹嘉彦. “三言两语”说香港[J]. 中国语言学学报, 1997/25(2): 290 - 307.
- [22] 王士元. 词汇扩散理论: 回顾和前瞻[A]. 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一辑)[C]. 黄正德主编,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154 - 158.
- [23] 谢耀基.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M]. 香港: 光明图书公司, 1990.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入编刊物

## 外语与外语教学

(月刊)

2002 年第 10 期

(总第 163 期)

2002 年 10 月 1 日出版

主办单位 大连外国语学院

编辑单位 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大连市延安路 94 号, 116002

电话: 0411 - 2803121 - 6388

E-mail: dwxb001@163.com

主 编 徐 曙

印刷单位 辽宁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总发行 大连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4 - 6038  
CN21 - 1060/H

邮发代号 8 - 22

国外发行代号 6248M

国内定价 5.30 元